

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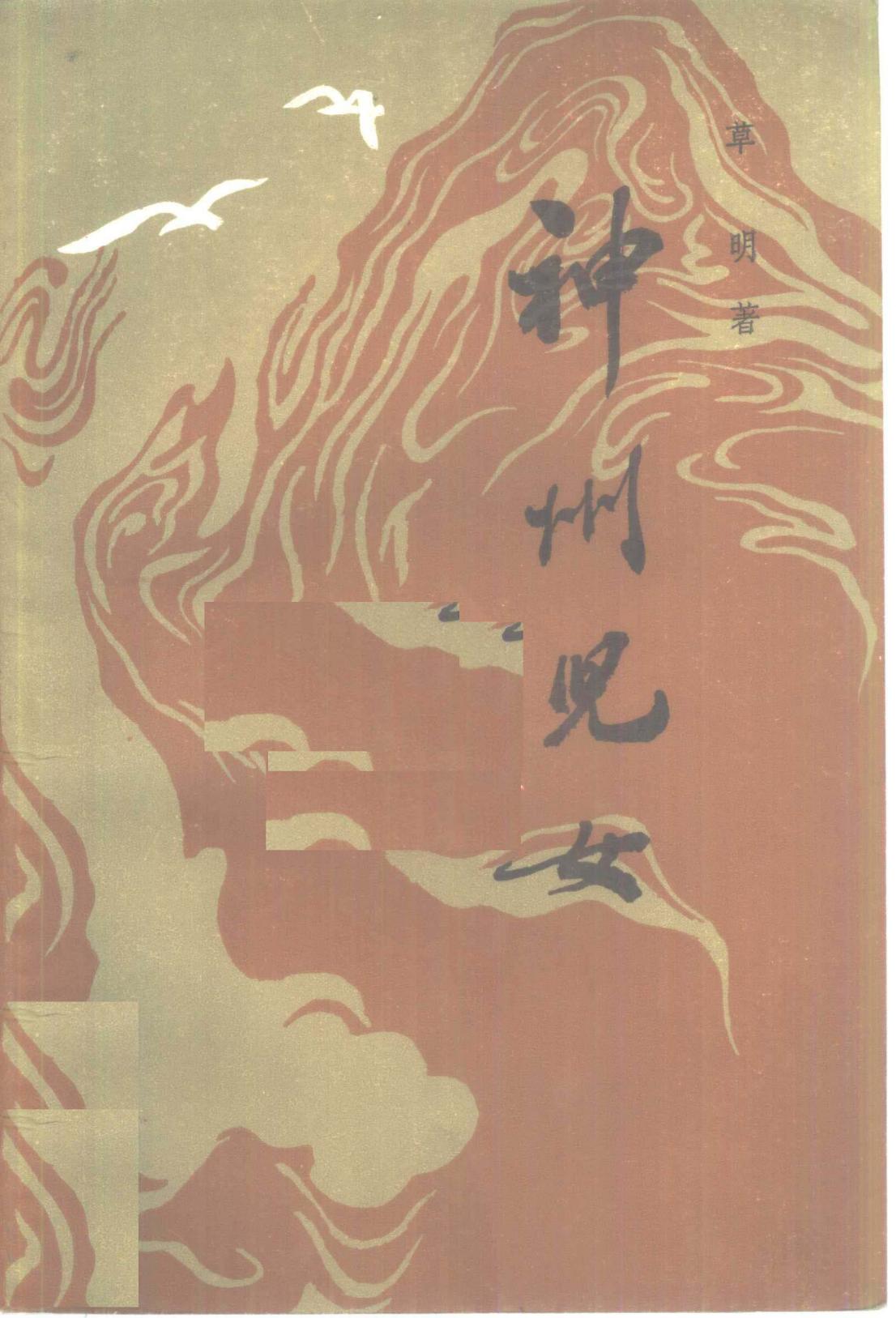
明 著

神

州

兒

女



神州儿女

草明 著

工人出版社出版(北京安外六铺炕)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6.25 字数: 415,000

1984年5月第1版 1984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57,000 册

统一书号: 10007·108 定价: 1.60元

林彪、“四人帮”“在工人中煽动派性，煽动武斗，煽动停工停产，反对各厂矿企业的革命干部、劳动模范和工会积极分子，并加以野蛮的迫害和摧残。他们制造各企业和整个工业、整个国民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反对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反对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反对一切合理的规章制度，破坏劳动纪律。他们的这一切反革命罪行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同时，也在全国工人阶级中引起了极大的革命义愤。各地都有大批先进分子不怕他们的白色恐怖，同他们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斗争的实践证明，我国工人阶级不愧是久经考验的立场坚定的革命领导阶级。”

(摘自邓小平同志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一日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致词)

序 言

王 崇 伦

终生从事工人题材文学创作的老作家草明同志，又把一部新的长篇小说《神州儿女》奉献到广大读者面前了！

这是她继中篇《原动力》、长篇《火车头》和《乘风破浪》之后，又一部以工业为题材，歌颂我国工人阶级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的优秀著作。

《神州儿女》凝聚了草明多年的心血。自一九六五年，草明从鞍钢来到北京，一直在北京第一机床厂体验生活。十年风风雨雨，她住过牛棚，到农场劳动，被抄家，进学习班……备尝了十年动乱的苦头，体验了以前不可能体验到的特殊社会生活。但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她都沒有忘记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作家的责任和使命，沒有忘记她的生活基地，沒有离开她所熟悉的工人师傅们。多年的积蓄、实践和含辛茹苦，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神州儿女》所描写的是十年动乱时期的社会生活，但它不是血泪、死亡、悲悲切切的生活翻版，而是真实地、生动地描绘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殊死斗争的壮丽画卷。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艰难曲折的，是一直沒有停止过的。”《神州儿女》的主题正是这一伟大斗争生活生动而又形象的反映。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神州儿女》不仅是一篇声讨林彪、“四人帮”这些人民公敌的犀利檄文，更是一曲歌颂党、歌颂人民群众对林彪、“四人帮”斗争的胜利凯歌。作者以一个工业城市为背景，比较全面地再现了十年动乱的历史过程，并力图挖掘这场动乱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广阔而又深刻地反映

了当时纷纭复杂、瞬息万变的特定社会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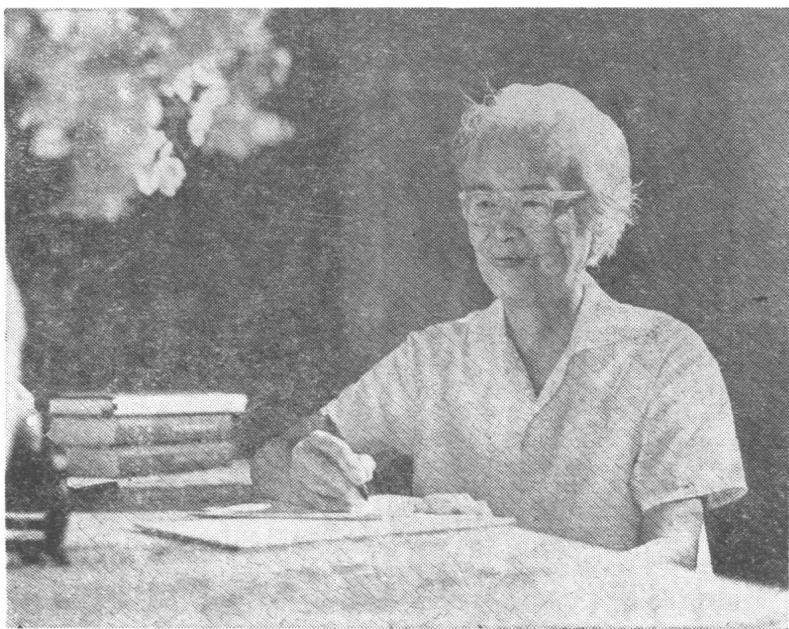
小说是通过艺术形象来反映生活的。书中刻画的劳动模范、中年干部赵建中，解放前参加了地下党的老干部宋祥宁，勤勤恳恳、忘我工作的知识分子刘彦以及新一代工人宋小顺等人物形象，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赵建中的妻子张世芳，更是一个塑造得比较丰满感人的典型。在她的身上，既体现了中华民族优秀劳动妇女的传统美德，又反映了社会主义时代先进妇女纯洁而又崇高的精神境界。

从一九五四年起，草明同志长期在鞍钢体验生活。从那时开始，我们就认识了。她虽然身材稍瘦，但精力充沛，在兼任第一炼钢厂党委副书记期间，和那里的干部、工人、工程技术人员一道工作，亲密无间。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她还利用业余时间热心培养文艺青年，其中有一些人已成为工人作家和文艺积极分子。草明对工会工作也十分关心。一九七八年，她应邀参加了工会“九大”。近几年来，她还对工会的宣传工作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草明同志是一位老文艺工作者。远在三十年代初期，她就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有幸亲自受到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鲁迅先生的教诲，用草明的话说：“我吃过他的奶！”以后，她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又荣幸地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明确了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方向和目标。抗战胜利后，草明拖着多病的身体，毅然骑着毛驴从延安到了东北，在邮政局、水电站、机车车辆厂、鞍钢等厂矿工作和体验生活，始终战斗在工业战线上。几十年来，她坚持生活在群众之中。人民是她的母亲；她是人民的女儿，也是人民群众的忠实代言人。她用自己的实践执行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的方向。因此，她的新作——《神州儿女》获得成功，绝不是偶然的。

我热烈祝贺这本书的问世！

一九八三年八月



第一 章

陈宝元和周勇挟着赵建中的发明创造的材料，急匆匆地骑车到燕门市委传达室。传达室告诉他们，通过这座办公大楼朝北走，便看见后花园。沿着花园的曲径走到尽头，便是市委常委们开会的地方。

他俩按着指点的方向，走完办公大楼楼底，通过北边一道门之后，果真豁然开朗，百年的高大的松柏和老槐树遮天蔽日，十分凉爽。二人深深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朝前走去。忽然，一个大花坛挡住了去路。花坛的直径有五米长，上面种满各种鲜艳罕见的花。园里铺满绿茵茵的台湾草，人们走路必须绕着半圆的用小石子砌出花纹的小路走，别无他径。陈宝元啧了啧舌头，没有说话，和周勇继续朝前走。走了一段路，还没有看见有会议室，路旁只有一座被刺梅、丁香包围的凉亭。他们正欲往前走，却又被一座假石山挡住了去路。这九弯八曲的小径，竟把二人的急匆匆的劲头煞住了。周勇沉不住气了，嘟哝了一句，说：“这儿莫非是大观园！若是小赵看见，又得提意见了。”

陈宝元也会心地笑笑，加添说：“难为党委机关竟挑选这么个天堂。”

好不容易绕过假石山，又走了一段路才看见一道石砌圆门。通过石圆门，里边有个网球场，再朝前望，看见了几所小巧玲珑的办公室。

这二人的感慨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个花园本来是解放初期从一个老学究的后代那儿买来的，已荒芜不堪。自从文教书记祝尚礼来此之后，苦心经营，盖了凉亭、石山、水池，又从老家弄来许多奇花异草，并盖了几间精致的办公室和一个小会议厅，便于

他的老战友、市委第一书记杨耀祖办公和书记们开会。因为杨耀祖的宿舍就在花园的隔壁，只要通过一道小侧门便可走到办公室来了。因为这所花园搞得有点豪华，曾受到上级的批评，群众对此也很不满。一惯俭朴的杨耀祖那里敢在这儿办公，无奈大家的规劝，说钱都花了，不用更浪费，他才勉强和祝尚礼等几个书记在这里办公。祝尚礼的住宅在花园的西边，只要另开一道小侧门，便可走到他的办公室了。这个花园既是书记们办公重地，一般干部们轻易不到这儿来，所以十分幽静，只听得见小鸟儿在歌唱。可今天，这里却很不一样。正当陈宝元和周勇沿着幽径往前走的时候，小会议厅里却争论得很热闹，连小鸟儿也侧着脑袋在倾听。原来是国际技术交流会议邀请我国派代表参加，中国科学技术委员会决定派出一个由科技人员组成的代表团去出席。成员名单已定，科技委员会建议由代表团中的燕门市的代表、青年劳动模范赵建中去做学术报告，所以到燕门市来征求意见。谁知科技委员会党组书记兼副主任宋祥宁一提出，便遭到燕门市委文教书记祝尚礼的反对。

祝尚礼身材略嫌肥胖，说话时还带一点台州口音。虽然这儿的人都听惯了，但是他的秘书陆文瀚还有时给他做些翻译和注脚。祝尚礼用食指抖着烟灰，耐心地向大家解释：“同志们须知，赵建中有创造、重实际，好是好，但他连小学都未上过，怎能把实际上升为理论到国际讲坛去讲？你想，面对西方那些大知识分子，他那里是人家的对手？只有我国在西方留过学的人才对付得了。”

参加这个会的，除市委主持人祝尚礼之外，还有书记兼工业部长王胜等。市委第一书记杨耀祖听说会上有争论，也抽空赶到。他在燕门市委从当书记到担任第一书记已有十来年了。他对常委会是熟悉的。常委会里有不同意见是经常有的事。通常，王胜好持相反的意见，祝尚礼却喜欢和稀泥。对待这样的情况，杨耀祖的经验是引导大家把各种意见充分考虑，然后统一思想，作出决

定。他思忖宋祥宁提出由赵建中去演讲，显然是上级同意的，他来市委征求意见，不过是一种民主作风罢了。奇怪的是祝尚礼今天坚持反对意见，而且是少数，这是少有的现象。他作难了，只好用他那种特有的活跃的神情和他的不太重的台州口音笑着说：

“老宋说的有理，中国工人登上国际科技讲坛，这本身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证明。资本主义国家那有劳模？那能让工人劳模去开会？不过我也理解老祝的意思，外国科学家是很重视理论的，他追问你的理论根据，万一工人同志回答不上就砸锅了，是要慎重些。大家再考虑考虑。”

王胜抢着补充道：“那至于砸锅？赵建中早已晋升为工程师了。理论水平也不低，人家是自学成材的嘛！”

宋祥宁是铁匠出身，三十多年前那柄二十来斤的铁锤把他锻炼成顽强的、勇于斗争的脾性。他身高力大，好打抱不平，群众喜欢他。他刚满徒时已是有名的“宋三锤”了。原因是有一回，他师傅要打一块异型铁模，但是怎么打也不就范，好几个师傅也摆弄不了。刚出师的宋祥宁笑嘻嘻地走上前去说：“待我来试试。”只见他朝手心吐上唾沫，抡起二十四斤的大铁锤，用眼瞄准了铁模的角度，只打了三锤，那块异型铁模就打出个雏形来了。以后，石板坊一带，“宋三锤”的名字就传开了。更重要的是几十年来党对他的教育和工作的锻炼，使他变得老练起来。这几年，他到科技委员会工作以来，成天和高级知识分子打交道。他虚心地向他们学习。在反右运动中，有个科学家说了几句牢骚话，有人批评他对社会主义不满，但宋祥宁尊重事实，分清是非，认为拥护社会主义是那位科学家的主要方面。经过思想帮助，没有把他划为右派。那些科学家、技术人员喜欢宋祥宁的坦率和热情，他也喜欢科学家、技术人员的勇于实践、勇于探求真理的精神。他认为不论中国或外国的科技人员，虽然学问有深浅，生活方式有差异，但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总该是一致的。他不明白老祝今天为什么反对赵建中去做演讲。他坐着听了半天听不明白，只

觉得别扭。于是，他清了一下嗓子，不慌不忙，既沉着又坚定地说：“你们的青年工人工程师赵建中，不是个革新能手吗？他在机械方面有好多创造嘛！同志呀，现在国际上有人封锁我们，又有人卡我们脖子，使我们工业战线陷入严重的困难。但是，通过工人和科技人员的努力，我们还是靠自己的力量继续进行建设。好呀，让工人们自己去讲讲他们的成就吧！不过，我们的技术是落后的，要老实地向人家学。这次出去，有学习人家先进技术的任务。让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人出去见识见识吧！至于由谁去演讲好，我赞成我们的团长顾总去讲，青年工人赵建中也去讲讲，这就两全其美啦！”他一口气讲了这些，越讲越有劲，眼睛闪射出光彩，好象新中国的机械工业的灿烂画图就在他眼前似的。后来，他又补充了两句，“至于怕赵建中的讲稿里的数据、科学原理不充分，那好办，让他们团自己去研究起草得啦！代表团里有顾总嘛！”

祝尚礼解释道：“你有所不知，那个革新迷，连小学都未念过。平常意见又古怪得很，专和人抬杠。”

“那倒不要紧，爱迪生还是报童出身哩！我国的华罗庚也没有念完中学嘛！”王胜安慰似地数落着。“何况我们党就是出人才，放牛娃当将军的、当部长的也不少。”

好几个人不住点头，特别听到赵建中的名字，都活跃起来。

有人问道：“啊，是那个革新迷么？听说他跟机器结了婚？”

“什么，难道女同志还有叫‘机器’的？”

会议厅里忽然轻松起来，有的人笑了。有的人津津有味地说小赵还未满徒就搞高速切削，赶超他师傅的事迹；有人夸赞这个革新迷善于运用辩证法来改进生产技术，能够用普通的钻刀加以改革，克服了坦克的特硬的钢板；他又连续攻克了许多技术难关，加快了工业建设的步子，对国防建设和钻探事业也作出了贡献，还为国家节约了大量外汇……

听着，听着，王胜接过话茬，一口气扼要地说出了赵建中成

长中一些动人的故事。

原来卖水童赵建中十二岁那年，认识了燕门军械厂工人、地下党员陈宝元。陈宝元看见这个卖水童很特别，他的水桶装得特别满，水不洒不漏。问他有什么窍门？那个一脸稚气的长得高高的卖水童把秘密告诉陈宝元。原来他的平底车用的是胶皮轱辘，水桶底下垫了稻草垫圈，水面上还放了块荷叶。这样，水就不爱往外洒了。陈宝元看见这个少年人喜欢动脑子，可又穷得实在可怜，便想办法收了他做徒弟，给他起了个名字叫赵建中。第二年，燕门市就解放了，赵建中被送到学校念书去了。念了三年书，他已十五岁了。为了生活，母亲叫他回厂干活。这时，军械厂已经和几个小厂合并成为燕门机械厂。他回厂时，他的师傅陈宝元已脱产当了车间的支部书记。他又跟周勇师傅学手艺。周勇手艺高，以不出废活著称。他看见这个小徒弟为人机灵，又刻苦努力，便把手艺都教给他，并且放手让他单独去干活。因此，两年工夫，小赵就能独立干许多活，样样够得上标准。陈宝元对他一点也不放松，说，“肚子里还是多点墨水好。”在业余时间，他一直教他学习文化，借给他许多书看；并请一位大学毕业的年轻技术员教他数学和一些技术的理论。这个大学生叫李文瑞，是个勤奋用功的人。他认真教赵建中，还常常进行考核。赵建中如饥似渴地拼命学。他很喜欢李文瑞的严格作风，亲热地叫他李老师。谁知李文瑞并不喜欢这个称呼，对他说：“叫我老李吧！”赵建中又改叫他李师傅。他高兴了，说：“抱歉，抱歉，我也当工人师傅啦！当工人最光荣。”从那以后，全车间的人也都叫李文瑞李师傅了。

一九五五年的一天，东北一个切削能手叫“刀具大王”的来燕门推广一刀多刃的新技术，说是能使生产成倍地增长。事也凑巧，他的表演就在燕门机械厂进行。那种一刀三刃的新技术，可以缩短时间，加大走刀量，深受机床工人的欢迎。小赵看傻了眼，看完表演之后，没等上级推广和动员，回到自己的皮带车床上就动手改。谁知装上三刃的刀头，车床不听使唤，吱扭吱扭地响，

皮带呼哧呼哧地在喘粗气，活废了。

有些人射出了冷言冷语，说什么“一刀三刃不关皮带车床的事！”。

还有人讽刺说，“嗬，刚会迈步就想飞，‘蛤蟆啃天——没见过’！”

十七岁的小赵听了不服气、不甘心。有个留了山羊胡的老人好心好意地拉着小赵的袖子到自己的床子跟前，说：“小伙子，我就不信什么三头六臂，一刀三刃还没有我的偏刀大翘好使哩！”

小赵看见老师傅和他一样使的是皮带车床，人家的刀头不颤不抖，皮带运转的很均匀，一溜摆着的活儿十分光洁，可就是出活不快。他决心要学山羊胡董师傅的优点，但还要想办法出活快。

他睡不着觉，吃不下饭了，脑袋瓜里闹腾得慌，有时觉得问题出在快上，有时又觉得问题出在角度上。究竟主要问题是什么？这天夜里，他在床上翻来滚去怎么也睡不着。忽然，他想起了陈师傅借给他一本毛主席的书，里头讲到做事遇到多种困难时要抓住主要的矛盾。他爬了起来，把妈也闹醒了。他说他要回工厂。任母亲怎样的哄劝，他都听不进，摸黑跑到工厂。他在车床上摆弄了半天，也不知道主要矛盾在那儿。后来他灵机一动，寻思：“师傅的床子不是皮带的，何不在他的床子上比试比试？”

他在师傅的床子上试了半天，额上的汗水滴嗒地往下淌。试验的结果，活仍然废了，但是床子没有吱扭吱扭地响，径向力正常。他拍了拍卡具，高兴地对它说：“谢谢你，我明白啦！”

“你明白什么？”前面出现了一个壮实的人影，大声问。

小赵吓了一跳，抬头朝前边一望，原来是他的师傅周勇走过来。

周勇也是想利用夜间，在皮带车床上先试验一刀三刃，帮助皮带床子解决问题。当他来到车间时，看见徒弟那瘦高的身影，心里一阵热乎乎的，不觉跑前去，一手搂着他的肩膀，亲热地说：

“好小伙，我猜中了吧，我就知道你半夜三更在这里试验。”

周勇不仅是小赵的师傅，而且是生产小组长，党小组长。他看见这个苦大仇深的小童工，经过学习，阶级觉悟提高了，技术上进步很快，他已经写了入党申请书。周勇心里特别高兴，他已两次向支部书记陈宝元建议，召开支委会，讨论一下小赵的入党问题……

师徒俩流了一夜汗，试验基本成功。第二天，李文瑞自动带着改革皮带车床的草图来时，看见小赵和周师傅都已试验成功了。他也连忙动手改正了两个地方，效果更好。后来又进行了反复试验，使效率提高了两倍。赵建中仿佛在一夜中长高了，长大了。支部书记陈宝元认为，小赵、周勇这一行动，狠狠冲破了某些老工人的保守思想，这比提高效率两倍的意义更要大得多。他趁这个势头表扬了赵建中、周勇的革新精神，来推动全车间的生产和技术革新活动。陈宝元和周勇对群众又做了过细的深入的思想工作。不到两个月，这个落后的皮带车床车间，第一次掀起了技术革新的高潮。李文瑞和赵建中没日没夜地工作，终于叫所有的皮带车床都使上了一刀三刃。小赵在这热火朝天的技术革新运动中，几乎每天都帮助别的机床搞到半夜三更才回家睡觉。大家亲昵地赠送给他一个雅号，叫他“革新迷”。

尝到了改革的甜头，人们的劲头更大了。他们象一队停不住蹄的马群，勇敢地朝前奔。小赵象是领头的那匹小壮马，被身后的马群紧逼着，只好四蹄离地似地飞腾。这情景，真把那个支部书记陈宝元乐坏了。他和周勇、李文瑞全力以赴地带领全车间职工，利用废旧材料，把全部皮带车床都革新过来，把皮带扔掉了。

赵建中逐渐成为全厂工人们的有求必应的技术员，并已是全市有名的革新能手了。市里的一些工厂，也常请他去解决某些难题。他几乎没有一个晚上和星期天得到休息的。他还要向李文瑞学习英语，学基础理论。

第二年，赵建中和李文瑞同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在那一

年，两人同时晋升为工程师。

赵建中和同伴们继续改革了各种刃具。最突出的是改进了钻刀，对军事工业，对矿藏的钻探和对大庆油田的开发作出了贡献。他和李文瑞合作设计了两台多用钻床，还着手设计了大型铣床取代大龙门刨床，为万吨轮船的建造作准备工作。一九五九年，二十二岁的赵建中已被选为全国劳动模范，出席了群英会。

王胜的叙述，把大家带到解放初期的情景里去。我国工人阶级以主人翁的姿态，把旧中国机械工业的可怜的落后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燕门机械厂的群众革新运动，就是我国机械工业发展的一个缩影。赵建中、李文瑞、陈宝元、周勇他们，都是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人物。

大家听了赵建中的故事，都深受感动，认为他的确是党把他从苦海里解救出来，是毛泽东思想哺育了他，使他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代青年工人中的佼佼者。

杨耀祖听了也很激动。他虽然早就知道有赵建中这么个劳动模范，但现在听大家一说，好象才第一次注意到自己这个城市里竟有这么一个杰出的青年工人。于是他点头称赞道：“小赵不仅在我们燕门是好样的，在全国来讲也是不可多得的人材。相信他到了国际讲坛上，能为我国增光的。就让赵建中去讲吧！”

宋祥宁回过头来问王胜，赵建中的材料送来了没有？王胜正在朝外望，忽然站了起来，嚷着说：“哦，来了，送材料的来了！”他看见了在门外的陈宝元和周勇，便赶快迎上去。大家跟着他看去，果然看见有两个人走进来，一位眉清目秀，牙齿微凸，神情稳重老练；另一位浓眉大眼，刚强机智。

宋祥宁走到两位师傅跟前，虽未见过面，却是满心欢喜地热烈地和他们握手，并高兴地接过陈师傅手中的材料。王胜立刻把陈宝元、周勇介绍给宋祥宁和两位书记以及常委们，说：“陈师傅原先是赵建中同志的开山师傅，现在是机械厂党委副书记兼加工车间总支书记。周师傅是赵建中同志的第二个师傅，现在是总

支副书记。赵建中的发明创造，他们二位一直都一块儿热情参加的。”

杨耀祖高兴地称赞说：“名师出高徒。你们辛苦啦！”

陈宝元讲着他们之所以亲自把赵建中的技术革新材料送来，是便于当面解释创造的过程。周勇还向杨耀祖简单扼要地介绍了赵建中解放前是童工、苦大仇深；又说他一直在刻苦学习毛主席的著作……

杨耀祖一面听一面不住点头，赞叹道：“‘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孟老夫子这句话，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呀！”

陆文瀚谨慎地笑问道：“杨书记，你年青时不一直是工人吗，怎么还捞着念《孟子》？”

杨耀祖得意地解释说：“这句话是我听一位大理论家引用过的。”

陈宝元、周勇和这些领导人说了一阵话，便告辞出来。王胜起身把他们俩送出门外。

散会后，杨耀祖坚决邀宋祥宁、祝尚礼上他家吃饭，好好叙叙旧情。宋祥宁高兴地抬腿就跟着杨耀祖走。祝尚礼把文件带回家，转身也过杨家这边来。宋祥宁注意到老杨的住宅比起市委后花园里那座办公室来，简朴多了。他心想，“老杨究竟是老杨呀！”

这三个老战友在一块儿少不了要喝点酒。对于酒，祝尚礼是行家，不看招牌，用舌头就能分辨出八大名酒来。但是，他喝时有节制，从未喝醉过。杨耀祖酒量不大，喝一点就脸红，并且话多得要命。宋祥宁能喝，不过他轻易不多喝，那是过去做地下工作时养成的习惯。

杨耀祖喝了两杯，话匣子就打开啦。他情感激动地说：“想想四十年前，咱们在石板坊那一会过的是什么日子啊！那一阵，那有闲心思在一块儿喝酒？”

宋祥宁也高兴地搭腔道，“可是那一阵，我却想到我们会有

今天的。”

祝尚礼吐了个烟圈，笑呵呵地赞赏说：“你们一个是革命的现实主义，一个是革命的浪漫主义，有趣！有趣！”

杨耀祖笑着摇头说：“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味儿是怎样的我不清楚，可左倾盲动主义的滋味我可尝够了！”

老宋点点头：“我听你讲过一些，你对这个深有体会。”

老杨又说：“王明路线比立三路线还‘左’。可我还是在后来‘七大’清算他们的错误时才清醒过来的。”

祝尚礼补充说：“老杨还被王明之流开除过党籍哩！那时我也在上海，不过跟康老学习写点理论文章，不致犯大错。但理论界也闹关门主义，‘左’得很！”

“你对左的东西一定有免疫力了。”老宋祝愿似地望了望老杨，继续问，“你讲讲他们怎样开除你的党籍的？”

杨耀祖从丹田里吁出一口冷气，说：“老古董了，还要讲几遍？但愿我们党再也不要犯这样的错误才好！”

宋祥宁认真地说道：“这难说。”

祝尚礼觉得老杨、老宋的担忧没有根据，便不以为然地说：“难道这些年‘左’比修正主义还危险么？你真是！”

宋祥宁不愿在这问题上展开争论，便把话题一转，挑起往事，问道：“听说老祝是你的救命恩人，是吗？”

祝尚礼鼻子喷了个圈烟，正想回答，杨耀祖抢先说：“咳，你的记忆力不行啦！我记得在石板坊那回出事后，立刻向你汇报过的。事情是这样的：那一天的支部会，我因为被工头叫住，替他做了点事，迟到了。碰巧老祝也迟到了。我从西边来，他从南边来。原来密探都已包围会址了。我没有经验，看不出来。一个密探正盘问我，老祝恰好赶到，他机灵地喝住我：‘老三，你还不回工场，老板找你了。’他一面掏出了二十元钱钞票，递给那个密探，叫他们买盒烟抽，便领着我溜走了。所以，那次支部会遭敌人暗算时，我俩没有被捕。事后，你介绍我到上海去，那儿的

党组织叫我打进‘老怡和’纱厂，当上了保全工。”

宋祥宁安详地评论着：“二十块钱不少哟，够一个地下工作者生活两个月。可对密探来说，还不够他塞牙缝呢！”

祝尚礼连忙解释道：“可不，那笔钱是互济会准备送给一个同志的呢！当时为了给老杨解围，我也顾不了许多了。”他转过脸去对杨耀祖说：“我去上海不是老宋介绍的。白色恐怖太严重了，我跑回老家台州去躲了两个月，失掉了关系。后来才到上海找关系，最后找到康老那里。幸好有一位在天津时曾和我一个支部的同志也在上海，给我证明，才给我恢复关系的。”

杨耀祖有点肃然起敬地说：“怪不得你和康老那么熟，原来你们三十年代就认识。”

祝尚礼谦虚地说：“也不能说很熟，我喜欢写点理论文章，自然有时要请教他。”

宋祥宁没有打岔，只是憨厚地微笑着，听着。

一直到傍晚，宋祥宁要回北京。杨耀祖留他不住，但他认为三个老搭当今天总算尽欢而散，于是，便心满意足地和祝尚礼把老宋送出大门。